

高若海
——
著

美的寻踪



从“望秩于山川”到“悦山乐水”

《考工记》与美学

《周易》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

1980年代中国美学史研究述评

19世纪英法美学概览

“虚”能生美

滑稽作为审美范畴的发生、演变史

幽默与讽刺的审美特性

怪诞的美学意义

阳刚、阴柔孰为美？

节奏：生命之律动

· 高若海——著

美的寻踪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的寻踪/高若海著. —上海: 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9. 3
ISBN 978-7-309-14140-5

I. ①美... II. ①高... III. ①美学-文集 IV. ①B8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6785 号

美的寻踪

高若海 著

责任编辑/邵 丹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 200433

网址: 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 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 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 86-21-65109143 出版部电话: 86-21-65642845

当纳利(上海)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张 16.375 字数 284 千

201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14140-5/B · 685

定价: 8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

吴中杰

高若海兄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，留系执教了一段时期，到了 70 年代末，才转到哲学系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。新闻学和美学，虽然同属文科，都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研究成果，但差距还是很大。新闻工作关心的是时事，以报道和时评写作为主，而美学则探寻生活和艺术中美的因素，所写的是理论和鉴赏文字，完全是两副笔墨。

但高若海兄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研究对象和文笔的转换，工作做得很切实。20 世纪 80 年代，就在《复旦学报》和《美学与艺术评论》等刊物上发表美学论文，我看后觉得质量很高，不是感想式文字，不是泛泛之谈，而是经过深入研究后的论说，资料丰富，说理透彻。90 年代我与一批博士生一起研究中国古代审美文化，就请若海兄做副导师，一起来指导博士生做研究工作。他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，只是那时他升任了复旦大学出版社总编辑，工作十分繁忙，只做了一年副导师，就未能继续下去。

大学出版社自从企业化之后，要应付各方面的关系，领导人并不好当。他们一面要与众多作者联络感情，便于将好的稿件组织过来；另一面还要与书商洽谈生意，为了打开书籍的销路，应酬之多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但若海兄还想要在这繁忙的生活中挤出点时间来研究美学，所以晚上时间就很少参加聚会。他的许多美学论文，就是利用晚上业余时间来完成的。这实在很不容易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曾经出现过两次美学热：第一次是在1956年中央提出“双百方针”之后；第二次是在“文革”结束之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。但这两次美学热的兴起，原因有所不同，因而内容也就有点两样。

第一次美学热，是中宣部为贯彻“双百方针”而有意抓的试点，既要有所争鸣，又不能触及文艺现状，所以讨论局限在美的本质方面，有美在主观派，有美在客观派，有美在主客观统一派，还有强调美的客观性在于社会性的。一时间争论得甚为激烈，却因为并不触及现实文艺问题，所以有点悬空的感觉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虽然偶有帽子飞出，结果都还相安无事，与胡风案、雪峰案截然不同。

第二次美学热，是群众自发产生的，原因是对“文革”中文化禁锢主义的反拨。因为没有人为的调控，所以谈得相当自由，但也相当泛滥。有些人为了赶时髦，凑热闹，什么都往美学上扯，一时间，美学成为显学。但正如钱锺书先生

所说：一为显学，便为俗学。美学与非美学的界限也渐渐模糊起来，反而失却了美学。当然，这段时期，也有一些认真的美学著作出版，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。

高若海兄正是在第二次美学热兴起之时，从新闻学转向美学研究的。但他并没有受“俗学”的影响，不写那种泛美学的文章，却是沉下心来认真研究；而且，也不像有些学者那样，动不动就写美学史、美学通论，而是从一些专书研究和专题研究开始。专书研究，如《〈考工记〉与美学》《〈周易〉美学思想的历史地位》，还有一些画论的提要；专题研究，如对虚白、喜剧、滑稽、幽默、讽刺、怪诞、阳刚、阴柔、节奏等范畴的专文论述，都很有质量。而无论是专书研究还是专题研究，他的文章都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结合。他在谈历史著作时，总能提出一些理论问题来探讨，而在分析范畴时，却很注意到这个范畴的历史内涵和演变情况。史中有论，论中有史，史论结合，是研究美学，也是研究一切学问的好方法。这种方法的运用，显然受惠于马克思和黑格尔，这与他从马克思的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和黑格尔的《美学》入手进行研究有关，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也。

此外，他还为《哲学大辞典·美学卷》写了《中国美学大事年表》，这是从事美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，不可缺失，却是很少有人肯去做的。

若海兄的研究，以中国古典美学为主，同时也涉及西方美学，《十九世纪英法美学概览》就写得很有功力。几篇范畴论，也是从中西结合的观点来论述的。生也有涯，知也无涯，学术研究当然要有重点，世上通才毕竟甚少，我辈常人，能做好一件工作就很不错了。但视野必须开阔，如果没有世界眼光，那么中国美学史也是研究不好的。

美学史、美学通论是宏观研究，专题和专书论述是微观研究。必须有扎实的微观研究，才能在这基础上进行宏观研究，否则就容易发空论。因此，相对而言，微观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。宗白华先生在美学领域里散步了一辈子，写了一些很有见解的中国美学专论，却没有去写中国美学史，大概也是不愿发表空论或者人云亦云的缘故；而有些缺乏微观研究的基础而匆匆写出的中国美学史，热闹过一阵子之后，就为人所忘却，则是一个教训。

若海兄今年七十有余，已经退休好几年了。当官的人在退休之后常有失落感，这也难怪，落差太大之故也；但我辈学人，退休之后却正是做自己所愿做之事的好时机。若海兄利用退休的岁月，整理出这本《美的寻踪》，就是明证。古人说，人生七十古来稀；今人说，人生七十小弟弟。我觉得，古来稀也罢，小弟弟也罢，只要身体条件许可，做一点自己感兴趣之事，其实也是养生之道。希望能再读到高若海兄的美学新作。

十年读书 “美” 不胜收

——学习美学的记忆（代前言）

费了好大力气，总算把这本小册子编完了。看着这些量少又非深奥的文章，不禁汗颜。

吾生也愚钝，虽然一生劳于文字工作，但多是为公事或他人，到了自己写点什么的时候，反而怠惰生倦，能拖则拖了。及至到了古稀之年，已无力新撰，才痛感可用的东西，竟然少到可怜。可我思之再三，还是听从好友之劝，把它们整理出来。郑伟宏学友对我说，“应当敝帚自珍”，想想也对。这些文字绝非敷衍马虎而得，都是灯下苦读、耗尽心思之作，虽未能颠覆出新，但总是力求有点别人尚未讲到的意思，用到别人尚未注意的材料，在总结旧意、融会新知上有所前进。

整理这些文章时，回想起我 1980 年代学习、研读、讲授美学的逝去岁月，想起遇难克难、砥砺自强的历程，想起有助于我的良师与益友，令人感恩与难忘。

—

我学习美学，始于1978年。当时百废待兴，中断多年的许多学科正待恢复，哲学系也酝酿着开设美学课。那时，我调入哲学系不久，总支书记倪大齐先生征求可以开什么课，并告诉我要成立美学伦理学教研组，于是，美学就成为我当时的可能之选。

选择美学既是无奈，又是幸运。哲学系原有的教研组马哲史、西哲史、中哲史均是强项，余源培教授、辛敬良教授、刘放桐教授、潘富恩教授领衔，人才济济，我自知基础薄弱，不能勉强。而美学组的教师只有樊莘森教授一人，正是用人之际，前些年学科研究停顿，有利于重新开始。拨乱反正之后的学科建设潮起，给了我研读美学的机会与鞭策。“天行健，君子自强不息。”我能否胜任，关键还在于自己。

记得1978年的4月，春末一个宁静的夜晚，章培恒教授带着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《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》（全四册）来陋舍，当章先生叩开寒门时，我喜出望外，看到书中新序为章先生所撰，他以大作和新书赐予处境不佳的我，顿觉暖涌全身。

得识章先生，是由朱永嘉先生的介绍。“文革”中，我曾在文科试点班负责教学工作。朱永嘉先生非常强调学生读

书，他要求请最棒的老师给学生上课，在古典文学方面，就亲点了刘大杰与章培恒先生。他告诉我，章先生学术功底深厚，于“胡风事件”中受到牵连，他于1965年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关于清末谴责小说的文章，是毛主席看过的，毛主席说，他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了。这自然使得我对章先生格外尊重，从而养成了遇到学业问题向他请教，乐于听他教诲的习惯。

章先生的到来，使得小屋春末增春，我向章先生谈起想涉足美学，但又心存顾虑，担心能否胜任。章先生听后，给我诸多鼓励。他告诉我，中文系的教师施昌东先生，被错打成“右派”，但施先生在“文革”中坚持不懈地研究美学，撰成《美的探索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欣然采纳，书稿已经出版。他还说，上海某先生是一种小语种的专家，开始他的这种语言并不是很好，但他挑起建设专业的重任，终成上海紧缺的专家。章先生讲的成事之例，背后都蕴含着有志者事竟成的哲理，这种点拨，滴滴入心，溶入脉流，直到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恍如昨日。

另一位指点我研读美学的是蒋孔阳先生。了解蒋先生的美学思想，首先是从读先生的书学得的，那时蒋先生所著的《德国古典美学》《美在创造中》《先秦音乐美学论稿》，译著《近代美学史评述》，是我案头的常读书，从书中，我体味到蒋先生的博大精深与有容乃大。后来，我陆续参与了先生主

持的一些编书活动，更得到先生耳提面命之教。

《美学与艺术评论》是蒋先生主编的学术丛刊。我因为负责丛刊出版工作，与蒋先生接触多了起来。先生平易近人，待人和蔼可亲，然而对稿件的学术质量要求甚严，每篇稿件均由编委轮流审读两遍，最后由先生定夺。记得一次编委会上，一位老师说，外地一位名气不小的教授投来一篇长文，写得并不理想，然而退稿又恐得罪方家，举棋不定、取舍犯难之际，是先生果断回答还是不用。这种不唯名而求实的学风，给我留下深深印象。先生关注国内外美学研究动态，他要求每期都要有国外美学论文的译文，介绍国外新出的美学书籍，刊登国内美学著作的书评。我曾向先生汇报，读到过一些美学论文，生吞活剥学术新词，晦涩难懂，不知所云。先生说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读通。好的文章应当是深入浅出，明白如话。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，必须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才行。我想，先生的理论文章，都能达到使人明白的境界，这就是理论大家的不同凡响之处。

蒋先生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邀，担任《哲学大辞典·美学卷》主编，我有幸参与条目的撰写工作。我们完成的稿子，都是先交辞书社的编辑初、复审，他们通过后再请蒋先生过目。令我感动的是，有一次，先生竟然到寒舍对我布置任务。那时复旦宿舍还未给私人安装电话，那天我从出版社下班回来，突然看到蒋先生到来，我既高兴又感到惶恐，先

生年事已高，让先生登上我所在的五楼陋室实在不安。奉茶后先生稍事休息，便与我谈起词典编撰事，先生告诉我，词典撰稿大体完成，要找几个人分别看看稿子：美学原理部分，邱明正先生；外国美学史，樊莘森先生、朱立元先生；中国美学史，就交给社科院林同华先生和我（后来书上的名称为“协助主编定稿者”）。先生谈到，还要补写一些长条目，“自然”这个条目就让我来写。先生说条目要分两层意思写，一层是中国美学所说的自然，指艺术创作的风格，另一层意思写西方美学讲的自然，是艺术摹写对象。最后，先生又让我为词典附录部分撰写中国美学大事年表。我明白，先生给我的任务，是我学习的极好机会，自当尽心尽力完成。谈话结束后，我搀扶先生步下楼梯，送先生回到第九宿舍的家里。经过几天努力，我把写成的“自然”条目送先生审阅，先生说可以，我才如释重负。

樊莘森先生是我教研组的领导。他原先研究西方美学，由于“文革”前美学课废止，改上西方哲学史，哲学系恢复美学课后，他上西方美学史，让我讲美学原理，以后有条件再开中国美学史。樊先生的安排，使我的目标相当明确。樊先生性格豪爽，喜饮白酒，我每次去他家，他都要请我饮酒。1981年秋季，他叫我去他家，告诉我福建人民出版社约写一本通俗美学著作。他考虑书名可以定为《美与审美》。我觉得这个书名不错，涵盖了审美的客体、主体，以及主客

体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一边饮酒，一边讨论提纲，酒助豪性，很快提纲就定了下来。几个月笔耕不辍，初稿完成了，送樊先生改定。福建人民出版社动作很快，1982年7月就把书印出来了。所惜的是书稿排出后，并未让我们校对，而当时手写稿可能字迹不清，以致发现文字有错漏。出版社答应我们的要求，按校正本出二次印刷本，封面也重新设计了。那时新一轮美学热方兴未艾，我们这本小册子，只是应时较早的一本。后来伍蠡甫先生主编《山水与美学》（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），收入我们书中的自然美一章。在这前后，我们共同署名，还发表了一系列美学随笔：《从“仰画飞檐”和“以大观小”的争论谈起》《审美与心境——看电影〈蝴蝶梦〉一得》《节奏美漫议》《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》等，分别发表在《文艺研究》《电影艺术》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等刊物上。

二

我是新闻学系的学生，没有学过美学，一旦确定了这个方向，就必须从头补起。从而开始了十余年的读书生涯。

读经典原著，是打好美学基础的重要一步。刚好，1979年出版了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，1981年出版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黑格尔《美学》三卷四册。然而这些经典

之书是相当难读的。马克思手稿中关于异化、对象化、自然人化、人的对象化、异化劳动、美的尺度等论述，对于我来说，都显得十分陌生，一遍、两遍读下来，还如云里雾中。恰巧随着手稿的出版，国内出现了研读手稿热，研究、解释的著作渐渐多起来。幸运的是，哲学系辛敬良教授也写了阐释手稿的著作，刚好我担任责任编辑，我一边读书稿，一边学原著，在反复阅读中，才理解为什么手稿是实践论美学思想的基石，才慢慢体味到马克思手稿的丰富蕴含与深远魅力。

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，读黑格尔《美学》，没有对黑格尔哲学体系、理论框架的了解，就不会明白“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”的真正含意。作为西方哲学基础甚薄的我，读起来困难重重，也是自然的事。我没有却步，一遍不懂，就再读一遍，配合阅读有关讲解德国古典哲学的书籍，读蒋孔阳先生的《德国古典美学》以帮助理解黑格尔原著。在《美学》书上，我用铅笔、红笔分别画出不同次阅读的重点，在书旁记下论述要点、段落提要，或者记下黑格尔说理的正、反、和的逻辑层次，以及尚待弄懂的地方。即使读了多遍，仍感到有许多地方一知半解。

黑格尔《美学》是西方美学的集大成者，要加深理解，还要读前此或其后的美学原著。柏拉图的《文艺对话集》、亚里士多德的《诗学》、鲍姆嘉通《美学》、康德《判断力批

判》、歌德《文艺对话集》、席勒《美育书简》、雨果《克仑威尔序》、尼采《悲剧的起源》、车尔尼雪夫斯基《生活和美学》、普列汉诺夫《没有地址的信》都是要读的。后来，我担任朱立元先生所著《黑格尔美学论稿》的责任编辑，在认真阅读书稿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他的理解，不少地方比我深入得多。这使我在编辑工作中，又得以重温《美学》这部经典著作。

跟上国内学者的研究脚步，是阅读的另一个方面。朱光潜先生、蔡仪先生的文集，宗白华先生的《美学散步》，李泽厚先生的《美学论集》《美的历程》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，高尔泰先生的《论美》，蒋孔阳先生的著作，使我对国内各派代表人物的观点有了基本的了解。新出的书籍、刊物、论文也一一予以关注，为着了解学者研究处于何等水平，有什么新的发现与进步，一来可以使自己的讲课不断充实新的内容，二来使自己的研究不要重复别人的工作，力求有所新见。

80年代中后期，国外后现代新观点、新方法研究美学的著作陆续译介过来，为美学研究打开新视野、拓展新领域，已出版的译著有：格式塔心理学美学代表人物阿恩海姆的《艺术与视知觉》、符号学代表人物苏珊·朗格的《情感与形式》、阐释学美学伽达默尔的《真理与方法》、接受美学尧斯的《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》、门罗《走向科学的美学》、

巴特《符号学美学》、贝尔《艺术》、桑塔亚那《美感》，新著迭出，使人目不暇接。自己力求有所了解，跟上学术更新的步伐。

中国古代并不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的美学著作，美感的直观快乐与人生的感悟相互渗透，艺术创作的体验与欣赏品评往往结合在一起，就使得中国诗论、文论、曲论、剧论、书论、画论，成为闪烁着美学思想光华的宝库。这些图书，都是不同时代审美意识的诗性与思性相糅的表达，但海量的文献，使人望洋兴叹。在里面寻觅美学的资料，前人、今人已经做了许多淘寻工作，我只能做个读书人，对已整理的成果，尽可能涉猎览读。

读书是乐事，买书也就成为嗜好。凡是出版的美学经典著作，像《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与美学》、黑格尔《美学》、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、鲍桑葵《美学史》、布克哈特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》、丹纳《艺术哲学》、普列汉诺夫《普列汉诺夫美学论集》、阿恩海姆《艺术与视知觉》，国内几大家的专著，均是出一部买一部。《西方文论选》《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》《文心雕龙》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《近代文论选》，郭绍虞先生编的《宋诗话》《清诗话》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《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“四库艺术丛书”中的《古画品录（外二十一种）》《画史（外十一种）》等文献资料也是我喜欢的书籍，看到就要收到我的书

架上。80年代初期，我们的工资还较微薄，伟宏介绍我去杨浦俱乐部上美学课，空军政治学院也邀我讲了一学期美学课，空政听课的学生分坐在好几个教室，据说有四百人。讲课的收入，除了贴补家用，重要的开支就是买书了。那时出书的信息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网上查询，逛书店就成为一大乐趣。我宁愿挤公交车到图书品种较全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，因为那里可以看到最新出版的美学书籍。每获新书，都甘之如饴。

随着90年代中期担任出版社总编，社里编务越来越重，我的美学的阅读便逐渐减少，不知不觉间停止了，一旦不进，则再也跟不上，实属可惜。

三

收在这本小册子的文章，大都是发表过的，并不是有体系的写作，把这些庞杂的文章汇在一起，书名拟定就成为难事。刚好记起了宗白华先生的一篇文章：《美从何处寻？》，顺此思路，就将其定为《美的寻踪》。虽然读起来并不上口，但还是较恰当地概括了书中的内容。宗先生是让人们从生活、从艺术中寻美，启发我从前人关于艺术品鉴、美的创造的记载中寻找美的踪迹。间或可以看出自己研习美学的踪迹。